

楊海明詞學文集

楊海明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第七册】
唐宋词与人生（卷二）

【第七册】 卷一一 唐宋词与人生

楊海明詞學文集



楊海明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词与人生/杨海明著.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10
(杨海明词学文集;7)
ISBN 978-7-81130-183-0

I. ①唐… II. ①杨… III. ①词(文学)—文学评论—中国—唐代②宋词—文学评论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7787 号

杨海明词学文集(第七册)

唐宋词与人生(卷一一)

著 者/杨海明

责任编辑/郭 杰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0890

传 真/0511-84446464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2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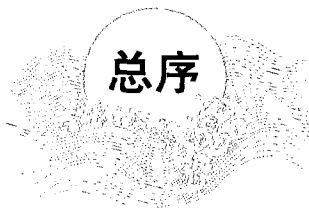
字 数/405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183-0

定 价/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总序

自1978年秋师从唐圭璋先生攻治词学至今，忽忽已过30年矣。回首当年，自己本是一位普通的中学语文老师，不意在攻读唐师的硕士研究生、随后又转入高校（苏州大学）工作之后，竟涂鸦出了一大堆评说唐宋词的文字，并在词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至我的博士生们现今要为我策划出版这套词学文集，不禁感慨良多。我深知自己既缺乏像夏承焘、唐圭璋等老辈学人那样深厚宽博的学养，也跟不上新时期所涌现出的青年学者那种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的迅猛步伐，充其量只是一个衔接两代的过渡性人物，因此要出文集，不免有些汗颜。但转而一想，对我来说，这套文集所收的旧文好歹记录着自己在词学研究领域里跋涉过的一连串足迹，把它们整理出来总算做了一番“盘点清理”和“立此存照”的工作，未尝没有一点意义；而对不少读者，尤其是很多青年学子来说，像《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论稿》、《唐宋词纵横谈》、《唐宋词美学》等旧书，由于后来未曾再版过，故在书店难以寻获，因此这次“打包”再版，也可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我同意了门生们的建议，由他们分工协作对旧稿作了一定的校订，终于推出了这套词学文集。宋人陈与义曾有词云：“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临江仙》）对我而言，若是改动其中一个字，变成“三十余年如一梦……”，便能很表达此时看到这套文集的内心感受：往事早如云烟，此身也已垂暮；这套文集所收的旧文其优劣、良莠就让读者和后人去评说吧。而我本人则要闲登小阁去享受那为时有限的余生了。

本文集共八册、十二卷。下面，分别对各册内容作具体说明。

第一册由卷一、卷二组成。

卷一《唐宋词风格论》：此卷原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出版。后来发现，台湾木铎出版社 1987 年盗印过它，易名为《唐宋词的风格学》，且隐去了作者的姓名。韩国新雅社 1994 年将其译成韩文出版，翻译者为李钟振教授。

卷二《张炎词研究》：此卷原由齐鲁书社 1989 年出版。

第二册收录卷三《唐宋词史》。此卷原由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出版，后由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 年再版。后者对前者略作修订，主要是改正了一些错字和删除了某些不必要加的引号，内容基本不变。此次再版，依照后一版本。台湾丽文文化事业公司 1996 年出版了它的繁体字版。韩国新雅社 1995 年将它译成韩文出版，翻译者为宋龙准、柳种睦先生。

第三册收录卷四《唐宋词论稿》。此卷原由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出版，其中选录了我自 1981 年至 1986 年间发表的论文 32 篇。

第四册收录卷五《唐宋词论稿（续编）》。此卷为这次所新编的论文集，共收录论文 35 篇，其时间跨度较大（1984 年—2008 年），主要是从《唐宋词论稿》出版以后所陆续发表的论文中选辑而成。其中内容大致分成六类：一是对唐宋词的魅力来源，尤其是其人生意蕴作出探寻；二是对唐宋词的心理内涵作些剖析，兼论“角色转换”对这些意蕴生成的重要作用；三是词论研究，以及我对于词学研究的若干思索；四是从传承和变异的角度来对唐宋词进行文化考察；五是读唐宋词的一些心得，它们所涉及的问题较多；六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文章，其中既有两篇论宋人散文的文章，还有三篇论析夏承焘先生治学历程和回忆唐圭璋、段熙仲先生往事的文章，收录这后三篇主要想借此表达对先贤的缅怀之情。上述 35 篇文章，以前散见于各种报刊之上，此次结集出版，可省读者查检之劳，姑取名为《唐宋词论稿（续编）》。

第五册收录卷六《唐宋词美学》。此卷原由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第六册由卷七、卷八、卷九、卷一〇组成。

卷七《唐宋词纵横谈》：此卷原由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台湾丽文文化事业公司 1995 年出版了它的繁体字版，易名为《唐宋词主题探索》。

卷八《宋词趣谈》：此卷原由台湾业强出版社 1997 年出版。它的学术性不强，但趣味性和可读性尚可，因大陆读者不易读到，故在此再版，可供非专业的读者阅读消遣。

卷九《李璟·李煜》:此卷原由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为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中的一种。

卷一〇《东吴绛帐履痕——序跋选录》:此卷收录了我为学生们的学术著作写的序跋。

第七册收录卷一一《唐宋词与人生》。此卷原由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第八册由卷一二、附录组成:

卷一二《宋词三百首新注》:此卷原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合作者刘文华女士乃是我的妻子,不幸已于近时病逝。几十年来,她在生活和工作上助我良多。今日再版此卷,也作为对她的一种悼念。台湾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据此重排,出版了它的繁体字版,易名为《宋词三百首鉴赏》。

《附录》四种:一是崔海正教授所写的《论唐宋词专家杨海明——当代词学家系列研究之一》。二是曹辛华博士所写的《杨海明与唐宋词研究的深化》。这两篇文章的撰写,其作者事前事后都未与我本人作过沟通,完全是他们个人意见的表述。照我看来,其中颇多溢美之词而缺少中肯的批评,实在愧不敢当。但它们却能从一定程度上揭示我的某些研究“特色”,可供我自己反省并供读者参考。而除此之外,很多师友(如曹济平先生、潘树广先生以及刘扬忠、肖瑞峰、王兆鹏、刘尊明等先生)和学生(如邓红梅、赵梅、闵定庆、钱锡生、王晓骊等博士以及浙江大学的张锦同学)也曾为我的一些论著写过书评,但因篇幅的关系,这里就不再收录,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歉意!三是王晓骊博士所记录的《背靠遗产 面向当代——杨海明教授词学访谈录》,它概述了我从事词学研究的历程以及研究唐宋词的若干心得体会,也可提供给读者阅读。四是张幼良博士所撰《瞬间三十年——杨海明先生学术年表》。

正如开头所说,我在这30年左右的时间内竟不意涂鸦出了一大堆评说唐宋词的文字,其间的甘苦辛甜,自然一言难尽;而文章的优劣良莠,也心知肚明。总的来说,由于我的写作往往率性而发,主要凭兴趣和“感悟”,而不耐作缜密细致的思考,因此文章中的疏漏和缺陷(甚至错误)自然难免,还望读者多多指教!另外,由于我往往是先写成一篇篇单篇论文,以后又把这些论文中的观点和材料融汇在后来的专著中间;而在撰写单篇论文时,因每篇文章都要自成一个独立的“单元”,故而有一些观点和例证有可能会在全书中多次出现,或许会令人产生

啰唆重复之感。这里谨表歉意。再者,由于这些文章写于不同时期,早期的文章并不像现今那样讲求“学术规范”,故而现在读来肯定不够“规范”,不够严谨。这点也请读者鉴谅!追昔抚今,如果说这套文集所收的一些旧文,在“文革”结束不久、新时期刚开始的阶段或许曾有某些“闪光点”使人眼目为之一亮的话,那么时至今日恐就早已平淡无奇,甚至黯然失色了。所以我十分清醒地将自己定位为新旧时期转型阶段的一位“过渡型”的研究者,而词学研究的崭新局面和崭新气象则期待着后来者们去努力开启和努力创造——这也是我作为一名曾经的词学研究者所殷切期望的。

最后,要对引导我走上研究道路并给我以提携指导的唐圭璋师、孙望师、段熙仲师、吴调公师表示深切的悼念与感谢;对大力促成本文集出版并付出辛勤劳动的我的博士生们(曹辛华、曹志平、孙虹、薛玉坤等)表示深深的谢意,拙著引文均由他们重新查核,并详为注出;特别应该提出的是,陈国安博士在本文集的出版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其热情与认真令我十分感动,特在此也表示郑重的感谢;对大力资助本文集出版的江苏海门市教育局副局长许新海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支持本文集出版并花费很多心血的江苏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芮月英女史和图书编辑部主任顾正彤女史表示深深的敬谢之心。

杨海明

2010年10月



目 录

总序 / 001

【卷一一 唐宋词与人生】

自序 / 003

绪论 着眼“人生”:词学研究的新视野

——兼论人生意蕴是唐宋词的“第一生命力” / 005

上编 唐宋词人的人生态度和生命体验

小引 / 020

第一章 人生苦短:唐宋词人的集体性哀叹 / 021

第二章 醉入花丛:花间词人颓废的生活方式 / 027

第三章 人生长恨:李煜的悲剧性生命体验 / 032

第四章 忧惧衰老:晏殊词中的惜时心绪 / 040

第五章 走近世俗:柳永的人生哲学和人生况味 / 046

第六章 彩云易散:晏几道词中的怀旧心态 / 056

第七章 聪明睿智:苏轼的人生感悟和处世态度 / 062

第八章 凄清孤寂:李清照词所表现的女性情怀 / 074

第九章 晚节不终:朱敦儒暮年的人生悔恨 / 081

第十章 复国心切:社会责任感在南宋爱国词中的体现 / 088

第十一章 角色错位:辛弃疾的政治幽愤和人生悲凉 / 094

第十二章 无枝可依:姜夔的飘零之感和恋家之情 / 107

下编 两宋词中的人生世相和人生况味

小引 / 117

第一章 纵情欢娱:宋代社会的享乐风气和享乐词篇 / 120

一、享乐成风:宋人“快活人生”的社会土壤 / 120

二、城市风光与都会词 / 139

三、四时游赏与节序词 / 145

四、酒色歌舞与宴会词 / 151

第二章 诗意消遣:宋代词人的高情雅趣和“雅玩”词篇 / 157

一、宋代文人的嗜“雅”倾向 / 158

二、休闲生活与园池词 / 170

三、郊游活动与泛舟词 / 176

四、山水之趣与隐逸词 / 183

五、赏花之乐与咏梅词 / 190

六、结社唱酬与西湖词 / 203

第三章 “爱”的烦恼:宋代词人的恋情生活和“言情”词篇 / 220

一、宋人比较开放的恋情生活和“词为艳科”的一代文学奇观 / 221

二、带有喜剧色彩的艳遇词与欢爱词 / 229

三、浸染着悲剧意味的离别词与相思词 / 234

四、抚今追昔、长歌当哭的悼亡词 / 241

五、交织着恋情心理的伤春词与悲秋词 / 252

第四章 无处避愁:宋代词人的人生忧患和怨嗟词篇 / 260

一、嗟老叹贫、怀才不遇的寒士词 / 262

二、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贬官词 / 273

三、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伤乱词 / 284

四、衣食无愁、因闲而生的闲愁词 / 293

余论 试论词中人生意蕴对今人的思想启示 / 301

一、珍惜生命和看淡人生 / 302

二、知足戒贪和勇于承担 / 306

三、赤子之情和成人之思 / 313

四、寻觅诗意和享受闲适 / 321

参考文献 / 329

后记 / 330

再版后记 / 331

【唐宋词与人生】



卷一一



自序

在如何阅读和鉴赏唐宋词的问题上,我很认同清末民初词论家况周颐的一席话:“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样,便能臻于“吾性灵与(词人之性灵)相浹而俱化”的境地(《蕙风词话》卷一)。照我看来,这种读词之法所重视与强调的,即是读者须与古代词人进行有关人生体验的“交流”与“对话”,如此才能达到两代人之间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契合。此话如何理解?首先,从唐宋词人来说,尽管他们早已长眠地下,但其凝聚和贮存在那些不朽词篇中的人生体验却至今犹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活力。因此从表面上看,现存的两万余首唐宋词篇似乎只是一大堆历史文献,但即使是稍有悟性的人们一经接触它们,就肯定会感受到其中流淌着温热的生命暖流和保存着鲜活的人生百味。美国优秀作家福克纳曾说:“艺术家的宗旨,无非是要用艺术手段把活动——也即是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而到100年之后有陌生人来看时,照样又会活动——既然是生活,就会活动。”虽然唐宋词人在主观上或许并无此种意愿,但在客观上他们确又通过写词而把其生命活动和人生体验“抓住”并“固定”了下来;而当后之读者重读这些词篇时,词人的歌哭啼笑,词人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就都会得到复活和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老的唐宋词其实不老,尤其是它所贮存的丰厚人生意蕴则更保持着“常绿”的状态。故而读词实际就是在人生体验方面向前代词人“讨教”、“求援”的过程,也是在古代先行者中间寻觅精神知音和良师益友的文化活动。这时,读者处于“受众”的地位,他们必须澄思渺虑,静静地倾听和深深地思索发自唐宋词人的种种心声。其次,在此同时,读者在阅读和欣赏唐宋词时,却又会依据自身特定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对原作的意蕴作出多种多样的诠释和解读,并将自己的独特感悟融入对原作之“词境”与“词心”的理解之中,这就会进而扩展和拓深原词的思想意蕴。例如王国维读南唐中主李璟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两句,认为它们“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并以此为例说明:“故知解人正不易得。”(《人间词

话》)尽管这两句词本来只是描写秋景的萧瑟,用以衬托词中女主角哀怨的心情,但王国维却因他本人多愁善感的思想性格,得出了其中深寓忧患意识的结论。联系到李璟身处五代衰世和南唐国势飘摇的时代背景,王氏的理解确又是可以成立的。而这,就使李璟这两句词的意蕴变得更加丰厚和深沉。这就说明,读者在读词过程中并不总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他们可以且肯定会将其自身的某些人生体验反射给唐宋词篇,缘此就形成了读者与前代词人之间的跨时代“交流”与“对话”。而惟有这样的读词之法——读者尽可能地调动自身的人生经验和艺术想象力,“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才能真正把词读深读透。

所以讲到这里,提出“唐宋词与人生”的学术论题并就此展开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了。这是因为:唐宋词之所以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之所以在千百年后仍能引发无数读者与它进行心灵的对话与感情交流,基础就在于其贮存着能够贯通古今人心的丰厚人生意蕴。就当时而言,词在文坛上曾极度“走红”,原因即在于它畅快淋漓地宣泄了那一代人的真实感情,十分出色地“诗化”了他们纷纭繁复的各类人生体验。而对后人来说,由于古今人生境况的有所类似和民族心理的一脉相承,所以读者仍能在唐宋词中感到某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和稔熟感,于是便有可能产生两代人在人生体验方面的心灵沟通与(部分)契合。因此词学研究可以和应该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但若丢弃或遗忘了研究“词与人生”的课题,就好比打仗老打外围战而不向纵深挺进那样,未免令人深感遗憾与不足。正是怀着这种“补缺”的心愿,笔者不揣学识之浅薄,尝试作这方面的努力,撰写了这本小书。书中肯定存在着许多缺点,还望读者批评指正。倘使此书能够引起注意,激起古代文学研究者同仁们从“人生”角度探求各类古代文学作品之思想底蕴的兴趣,从而拓宽研究视野与研究路子,那就是笔者最感欣慰的事了。



· Ⅱ 绪论 Ⅱ

着眼“人生”：词学研究的新视野

——兼论人生意蕴是唐宋词的“第一生命力”

几千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其数量之多真可称得上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然而若加分析，则正如胡适先生所说，它们大致可分两大类型：一类是“死了的文学”，另一类则是“活的文学”^①。也就是说，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早已死去，它们在后代读者（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读者）中间，基本不发挥什么作用和产生什么影响，其价值主要在于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可供极少数专家学者当做“国故”去整理和研究，普通老百姓们则简直不知它们的存在，也一辈子都不会与其接触。而另一类作品就大不相同了，它们恒久地存活在世世代代读者的心中，既被每一时代的各种文学选本和教科书所不断选录，又经常会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化人之口头和笔端，其中有些名篇名句则更是妇孺皆知。由此可见，虽经时间长河的淘选和历史风尘的掩埋，浩瀚的古代文学中却仍有一部分作品始终保持着长盛不衰的生命活力，并对读者的精神世界产生着不同的“活性效应”。而在这后一类“活”的古代文学作品中间，从整体来看，则唐宋词就算得上是最富生命活力和最具“活性效应”的一种。

要想证明上述论点，证据是相当多的。例如，当您现在随便步入哪家书店，甚至是漫不经心地在街头那些主要出售言情武侠小说和时装美食杂志的书摊边作匆匆浏览，几乎都能见到各式各样的唐宋词选本和名目繁多的鉴赏读本。这就大可反窥见读者对于唐宋词的欢迎和喜爱程度。不过，我们在此又想改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唐宋词至今犹能产生的“活性效应”，即从词中名句经常在当代文化生活中“闪亮登场”，来看出唐宋词的虽“古”而不“老”。对此，先让我们从琼瑶作品的取名说起。

前些年，台湾女作家琼瑶的言情小说和据此改编的影视剧曾一度风靡海峡

① 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两岸,几乎形成一股“琼瑶热”。然而人们似乎并未注意到,琼瑶作品的魅力却在相当程度上是借力于唐宋词之“名句效应”的。不信请看它们的书名吧,十有七八就取名于词中的名篇名句。例如:《心有千千结》来自于张先的“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千秋岁》),《庭院深深》来自于冯延巳的“庭院深深深几许”(《鹊踏枝》),《寒烟翠》来自于范仲淹的“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苏幕遮》),《一帘幽梦》来自于秦观的“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八六子》),《烟锁重楼》来自于李清照的“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凤凰台上忆吹箫》)……这就说明,一方面琼瑶本人对唐宋词可谓深爱近癖和情有独钟,另一方面则因唐宋词的许多名句包孕着极为优美和丰厚的意蕴,所以即使是不熟悉它们的读者一见之下也立刻会产生出爱慕之心和好奇之感来。故而借助于用唐宋词中名句作为点睛之笔和精美包装,琼瑶的这些言情作品就确实因此而平添了顾盼生情的艺术风韵和哀感顽艳的心理氛围。这便可见,词之“名句效应”就着实身手不凡!同于此理,大陆的一些文艺作品也曾利用过这种“名句效应”。且举一例:新中国成立前有一部名叫《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电影(上集《八年离乱》,下集《天亮前后》),现今的老奶奶和老爷爷们差不多都曾看过,至今犹留有深刻的印象,而其优美而又悲伤的片名也是从李煜词中摘取来的。这些足以说明,唐宋词中的许多名句,至今犹有“招徕”读者的鲜活魅力,所以常会在当今的文学创作中“闪亮登场”,并对读者产生很强的诱惑力。

其次还可看词中名句的“代言”功能。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当你面对某种情景或身历某种境况之时,心恍惚若有所感,口却喑喑难以言表,或者是胸中涌起满腹激情,笔下却凝滞不通,但此际脑海中却蓦地跳出一两句现成的唐诗或宋词,帮你排除了一时的“言语障碍”,代你表述出了苦思冥想而难以言表的那番感悟或心思,这时你肯定会感叹古人的“先得我心”,甚至会觉得那句唐诗或宋词似乎是古人早就为自己所“预制”或“定做”的。这就不妨称作古典诗词的“代言”功能。而在这方面,唐宋词所发挥的“名句效应”就显得相当的广泛和突出。如下面这些人所熟悉的名句:“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李煜《乌夜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轼《江城子》)“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它们就经常会在人们身置某种境况时不期而遇地涌上心头。再如“老夫聊发少年狂”、“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人生自是有情痴”,以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等等词中的名句,也屡屡会流出于中国文人的笔端和口头,再妙不过地为他们“代言”了特定的心境和情愫。而特别还可提到的是,不少处于热恋或失恋状态的



青年男女,在自己的“两地书”或日记本中,更频繁地使用或偷偷地收集着很多内容有关恋情的唐宋词名句,诸如:“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顾夐《诉衷情》),“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牛希济《生查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生查子》),“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柳永《雨霖铃》),“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想不到唐宋词人在千百年前所写下的这些词句,竟然成了现代青年男女消解爱情饥渴的精神食粮!这就尤其突出地体现了唐宋词的精神魅力和“活性效应”。所以,即使是在普通人(只要稍具文化知识和文学修养)的日常生活中,唐宋词中的名句也是时常会“闪亮登场”的——请问,在那圆月当空的中秋之夜,有谁的心中不升腾起与苏轼一样的美好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而当人们离别亲人之后,脑海中又何尝不会浮现出与张先相似的离愁别绪:“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一丛花令》)。因此,尽管现已进入了以电脑和移动电话为标志的高科技时代,但唐宋词中所蕴涵的那些古老的文化信息和感情因子,却仍能在当代读者心中“复活”,它们时不时地会撞击人们的心灵,感荡人的精神。由此看来,自从唐宋词人在古代诗歌的长河中另辟了“词”这样一股支流之后,唐宋词就像一曲清溪浅流那样紧紧地伴随着后世读者的漫长人生,既用似水的柔情滋润他们的心田,又在需要的时候帮他们洗涤心头的烦恼。所以,即使仅从词中名句的经常“闪亮登场”这一相当狭窄的视野中,我们就能窥见唐宋词所蕴藏的丰厚生命活力和它对后世读者所产生的“活性效应”了。一句话:唐宋词真不愧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支“活的文学”!

其实,以上所述还只是词之“活性效应”的比较肤浅的表层现象。特别是我们用词中名句的“闪亮登场”来说明问题,实际远不深刻。这是因为,凡是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几乎全都具有这种“名句效应”;而像唐诗和某些古文名篇中的名句,它们在后世读者的文化生活和日常人生中“出境”、“出场”的频率和机会,或许就比词中的名句更显频繁。因此上文所述,仅是一个“引子”,接下来我们就该讨论另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了。这就是:唐宋词的生命活力和“活性效应”,其集中表现和深刻体现却尤在于它们对于中国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和心理面目的“柔化”方面,而这也正是唐宋词的最为“独到”之处。

自古以来的中国文化人,当然都读过许多书。故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的思想观点、人生理念乃至生活情趣、审美心理,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读书而获得的。在他们所读的众多书籍中,自然又以儒家经典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政史类著作显得最为重要。通过数百代人对这些著作的学习和传授,这就铸成

了整个封建士大夫文人的群体文化人格。但除此之外,文学作品对他们的影响却也不可小视。且以诗歌为例:撇开《诗经》作为儒家“五经”之一的崇高地位不论,就拿《离骚》、陶诗、杜诗这三类作品来说,它们就对封建社会的无数读书人产生过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屈子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愤,曾经激起过千百年来与他有着相似命运的士人之强烈共鸣;陶渊明的几首《归田园居》和一篇《归去来兮辞》(可以看做今之散文诗),又引动了他们多么深浓的归隐情趣;而一部被人称为“一饭未尝忘君”的杜甫诗集,竟又被囚禁在元朝狱中、誓不屈服的文天祥读得烂熟,并一口气衍生出了200首《集杜诗》。这就说明,正统的诗文作品,曾在凝铸和塑造中国士大夫文人的思想性格和文化心理方面,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作用。

而对旧时代的广大平民百姓来说,则由于他们读书机会较少和文化程度不高,故其接受的文学影响,就主要不是来源于典雅高深的散文和诗歌,而是来源于比较通俗的戏曲和小说。且以小说为例,昔年梁启超就曾有过论述:“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诲之,传诸铎而授之也?而下自屠鬻贩卒、姬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渍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能自拔。”^①其言虽则明显有所偏颇(一是只看到小说“含有毒性”的一面,二是把上述陈腐观念的成因统统归罪于小说),但它确实相当犀利地揭示了小说对于“人心”、“人格”形成的重要熏染作用(因此他在此文中又大声疾呼:“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以此类推,则戏曲对于民众心理的影响亦复如此。如像“私订终生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的才子佳人式婚姻理想,“莫谓老天不长眼,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因果报应思想,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戏曲舞台而向广大民众传播的。由此可见,无论是高雅的士大夫群体还是普通的平民群体,他们都曾从文学作品中接受过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只是其接受来源和所产生的思想效应有所不同而已。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词对读者所产生的思想文化影响。对此问题,我们可从两个角度来看: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9页。